



核心阅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作为今年七大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体现出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坚定不移深化对外开放的决心。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不仅着眼国内市场开放，也着眼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世界更大范围的开放合作，不仅着眼传统的要素流动，也着眼规则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不仅着眼中美经贸摩擦等挑战，也着眼世贸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机制建设。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在实现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观察世界开放型经济发展大势，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既是世界发达大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基本路径，也是当代国际贸易深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大幅度下调关税，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商品、资本等要素已经基本实现自由流动。然而，伴随互联网等技术进步及世界各国开放合作的深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环境出现较大改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问题日益迫切。立足新时代，中国积极寻求更高水平的开放，未来开放不仅仅是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更重要的是对接国际社会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竞争中性等更高规则标准的开放，这必然构成了推



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点。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在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要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放宽市场准入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重点内容。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通过自贸试验区等战略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先后设立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及海南等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行先行先试，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由2017年版95条措施减至2018年版45条措施，外资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门槛显著降低。另一方面，加快制定外商投资法，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强化对涉及外商投资规范

性文件制定的约束，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维权机制。外资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大幅度改善，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将得到有效保护。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在进出口平衡稳定增长。“要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出口和进口是贸易的两个轮子，重视出口与扩大进口是促进贸易增长并由此推动全球经贸增长的重要手段。在近年来复杂的全球形势下，中国不仅积极通过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优化出口产品国际布局，而且通过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等制度性成本扩大进口。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1—10月中国对东盟、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出口市场多元化局面不断深化。2018年7月1日起中国降低1449个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同年11月1日起降低1585个税目工业品等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中国关税总水平由去年的9.8%降至7.5%。与此同时，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2018年11月5

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是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开放性平台，为全球增加对中国出口或者借此平台扩大进口提供新的机遇。中国扩大进口不仅为诸多商品提供推介的机遇，也为大量商品对接中国市场创造舞台，为拉动全球增长提供支撑。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在共建“一带一路”。“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有效管控各类风险。要精心办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了“一带一路”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引发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正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2017年举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凝聚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识，深化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开放合作。然而，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企业，如果说前5年“一带一路”重在国家层面推动的话，那么未来就应考虑更多发挥企业的作用，有效管控各类风险将成为突出的工作。与此同时，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谋篇布局，精心办好此次峰会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投资贸易自由化是推动世界各国深化开放合作的两个轮子，也是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主要途径，世贸组织等国际经贸平台有效促进了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的较快发展和深度融合。然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增长分化，世界格局正在

加速变革，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正谋划构建全球经贸合作新规则新标准，世贸组织面临着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及治理效率较低等挑战。尽管世贸组织面临着多重挑战，但如果没有出现比世贸组织更好的平台，那么世贸组织不仅不能可有可无，而且将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贸组织改革提供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世界各国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在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要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成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及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关键。中美之间的分歧并非没有解决方案，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双边经贸合作规模巨大，经贸联系非常紧密，中美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也存在重要的联系，中美之间不仅有避免冷战的极端情形的谈判诉求，也有解决分歧的谈判空间。“和则两兴，斗则两败”。阿根廷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就中美两国经贸摩擦问题达成共识，同意停止进一步加征关税，这为解决中美经贸分歧提供了重要的方向。目前中美双方正在稳步推进相关谈判工作，未来中美将加强双边的经贸磋商，为中美的开放乃至全球的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上接1版）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决不能发生系统性风险；在科技领域，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国之重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在大国外交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等等。

坚持底线思维，要紧处是把这些底线守住，这些底线是决不能触碰、践踏和逾越的。但是，这些底线并不是现实中固定不变的一条或几条分界线，而是不同认识、不同价值、不同利益、不同力量、不同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价值追求当然会有各自的选择，信奉所谓“普世价值”的群体怎么可能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的利益归属自然会有各自的偏好，靠资本自我循环制造泡沫而逐利的行为怎么可能真心实意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保守地就底线守底线是不可能守住的。

军事学上讲，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坚持底线思维，斗争是最有效的手段。无论是防范风险的首选还是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说到底都是斗争之举。要想真正守好底线、守住底线，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与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作斗争，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作斗争，与一切阻碍历史进步的顽瘴痼疾及其行为作斗争，与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作斗争，与一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治国理政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又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这样的斗争要敢于碰硬、敢于动硬、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所以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以“路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这样的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而是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在斗争中实现我们的目标，在斗争中站在道义和战略制高点，所以更需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提高斗争艺术，优化斗争策略。

自觉使命担当，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争取最好的结果

守住底线已经不容易，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仅仅守住底线又是远远不够的。从最坏处着眼、从最好处准备，是要朝好的方向努力、

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底线思维不失底线，意在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改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把这句话用到坚持底线思维上同样一语中的、切中肯綮。底线思维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但真正能掌握住、运用好这一方法，能把这一方法发扬光大，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人使命担当的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讲：“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是对人民幸福的担当；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对民族命运的担当；打铁必须自身硬，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全面从严治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锻造，这是对管党治党的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是对美好世界的担当。

正因为有这样的担当，眼睛始终盯着底线。直面风险、直面挑战、直面矛盾，不麻木不仁、不讳疾忌医、不得过且过。近而言之，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远而言之，把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统筹起来，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

还是因为这样的担当，心中始终想着更好。不用扬鞭自奋蹄，不仅守住底线不出事，更要精益求精干大事；不仅接接力棒，更要跑出好成绩。在国家建设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升“两步走”战略部署，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第一步走的目标提前到了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在执政党建设上提出“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要求，非有大担当不能如此；这样的思维、这样的作为，非有大觉悟不能如此。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这样的担当与觉悟，很好地提高底线思维等治国理政的能力，带领中国社会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走向新时代的。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时一明确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201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再次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一以贯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必须一以贯之。”可见，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关键词。

要把党的领导和组织“融合”“内嵌”到公司治理架构，是一项需要精心设计、统筹实施的系统工程。在整体的设计和实施方案出台之前，部分国有企业采用了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规定的做法。但是，“前置”毕竟不是“融合”“内嵌”，我们应该在国有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各个环节设计有效的机制，把党的领导有效地融合、内嵌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构。建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修订、完善对国有企业股东会、董事会、高级经理人员和监事会的管理规定，确保股东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监事会的核心成员同时都是党组织的领导成员，通过对这些成员的委派、选举和管理实现党的领导、组织与公司治理架构的融合和内嵌。这些成员在党组织内部先取得一致意见，再把这些意见贯彻到公司的法定程序中，就能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整贯彻到公司决策、经营和监督的整个过程。具体思路 and 措施建议如下。

在股东会层面，规范对国有股东代表的委派和管理

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国有控股公司设立股东会，作为股东的国企都应该委派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熟悉所投资公司产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干部担任股东代表。在股东会会议之前，单一国企控股公司的国有股东代表应该按照所审议事项的性质向股东公司的董事会或经营管理层请示并取得授权；多个国企联合控股公司的各国股东代表在分头请示之后还应该进行协调、取得对所要求表决议题的一致意见。必要时，多个国企联合控股公司的各国有股东代表中的党员还可以成立临时党小组统一思想。这样，就能保证党的领导、组织与国有控股公司股东会的融合。

在董事会层面，规范对董事会组成人员、董事长的委派和管理

对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董事长、副董事长等都由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机构委派、指

定。因此，应该由国资委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管理程序，保证董事长、副董事长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是通过党组织严格考察的干部。

对国有控股公司，作为控股股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他国有企业在公司股东会中拥有多数表决权，应该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牵头与其他出资的国有企业协调，确保通过股东会提名和选举的程序、让通过党组织考察的干部占据董事会的多数席位，确保公司董事长由党组织委派的干部担任。

董事会中的党员干部同时又是公司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在董事会开会决策前，董事会中的党员干部应先就重大事项协商一致，确保董事会的决策符合党的方针政策。

加强对公司高级经理人员的管理

既然董事会的多数成员和董事长都是党的干部，而《公司法》规定公司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选聘，那么就可以通过董事会的表决机制，保证核心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经过党组织严格考察的干部或党组织信任的同志。

高级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经营，他们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怎样在保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选聘和退出机制，建立激励充分、约束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亟须积极探索、循序渐进。

结合纪检监察机制，强化监事会职能

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会选举，国有股东同样可以通过提名和表决的程序，保证监事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党组织选拔或信任的干部。在提名时，应适当考虑监事会与纪委的交叉任职，有效履行和保证在党的领导下的监督职能。

以上的思路和途径，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机构的领导方式所成功验证。比如，《人大组织法》并没有规定重要议案要先经过人大党组的“前置审批”，《政协章程》也并没有规定重点提案要先由政协党组“预审”。党在人大、政协的“领导核心”作用，就是通过提名、选举、表决等法定程序，通过与人大、政协立法、议事、建议的各个环节的融合和内嵌实现的。

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这就要求有效划分企业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的领

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架构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 陈利浩

导核心作用，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力，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用党对国有企业内嵌式、全过程的领导，逐步替代部分国企在公司章程中把党组织作为具体程序的“前置”环节的做法，既能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能完全符合刚刚更新的《公司法》的规范性要求，更能有效回击对我国“国企扭曲竞争”的责难，展示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